

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

On Paronym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lash in Han Dialects

メタデータ	言語: zho 出版者: 公開日: 1999-10-31 キーワード (Ja): キーワード (En): 作成者: 太田, 齋, Ohta, Itsuku メールアドレス: 所属:
URL	https://kobe-cufs.repo.nii.ac.jp/records/1636
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
Attribution-NonCommercial-ShareAlike 3.0
International License.



论汉语方言中的 “类音牵引”和“同音词冲突”

太 田 斋

一般说来，一对或一系列相互有类音关系的词往往有两种相反方向的音变倾向：一种是其中的一个向另一个靠拢，终于同音化；另一种是为了避免误会，用改音或改词等手段扩大差别。前者叫做“类音牵引”(paronymic attraction)，后者叫做“同音词冲突”(homonymic clash)。前者有别名叫“同音牵引”(homonymic attraction)，但本文不采用它。现据《言语学大辞典》(日本三省堂 第6卷【术语编】1996.1 第1393-1395页)“类音牵引”条略加说明一下。在说话者的意识里，一个个的词决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在意义以外，语音形式上也呈现各种联合关系。因此一群有类音关系的词语之间总有一种像引力的力量互相牵引。这种牵引作用不一定需要意义上的关联。有意义上关联的变化，把它叫做“俗词源学”(folk etymology)或者“交感”(contamination)。这三者的界限有时不能截然划分。下面一些算作后者的例子，本文也把它们包括在“类音牵引”内一起讨论。

本文以‘’代表一系列同源词，以“”表示与其字音对应的汉字。因篇幅所限，方言例子出处大都不注明。有些字的标音用“汉语拼音”，为了区别于国际音标，把它们放在//中。本文所说的“同源词”及“类音词”，其讨论对象是一般会话当中出现的词音，这不一定等于读字时候出现的字音。文中所说“同音词”是广义的，有时扩大含意，连“类音词冲突”也包括在内。

1. ‘燕’—‘雁’；‘蝙蝠’—‘蚂蚁’；‘蝙蝠’—‘壁虎’

先看“同音词冲突”的例子。为了避免误会，同音词往往发生特殊变化，如“附加说明成分”、“改词”、“改音”等等。严格说来，“附加说明成分”也是一种“改词”，可是我们这里把“改词”限于替换“词干”(stem)，以区别两者。下面是“附加说明成分”的例子：

山西屯留：“燕：～子”ian⁵¹(去)≠“雁”ian¹³(阳平)

小燕儿 ɕio⁵³⁴⁻⁵³ iər¹³ : 大雁 ta¹³ ian⁵¹;

雁 ian⁵¹

材料来源是《屯留方言志》，该书作者张振铎、刘毅二位先生已指出‘燕子’为了区别于‘大雁’加儿尾(第14页)。此方言里一部分浊声母(即古全浊和次浊)去声字现属于阳平。看该书同音字表，“燕”、“雁”声调不同，可是作为一个词，“雁”念为去声，与“燕”单字音相同。不知“雁”字是原有去声单字音，还是经过特殊音变后读为去声。看来，“小燕儿”的连读变调也较特殊，不符【上十去】的规则，而与【上十阳平】一致。也许是“燕”另有阳平字音。即使“燕”、“雁”两字不完全同音，但有类音关系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由于同音冲突，不只‘燕子’加儿尾或子尾，前面加“小”字，‘大雁’前面也加“大”或“老”字，强调两者大小对比以免误会。下面补充一些例子：

河南开封：燕儿 iər³¹² ↔ 大雁 ta³¹²⁻²¹³ ian³¹²

河南郑州：小燕儿 siau⁵³ iar³¹² ↔ 雁 ian³¹²

河南邓州：小燕儿 siə⁵⁴ iər³¹ ↔ 大雁 ta³¹²⁻¹³ ian³¹

山东牟平：燕儿 ianr¹³¹ ↔ 老雁 lao²¹³ ian¹³¹

小燕儿 ɕiao²¹³ ianr¹³¹

山东济南：燕子 iā³¹⁻⁴² tsŋ⁰ ↔ 大雁 ta³¹ iā³¹

山东冠县：? ↔ 雁哥 ian³¹² kə⁰

陕西白水：燕弟(缺音标) ↔ ?

贺登崧神父(W. A. Grootaers) 1946年指出，山西大同‘蝙蝠’和‘蚂蚁’发生同音词冲突。⁽¹⁾近十年来，山西刊行了不少方言志。我们能从其中找出如下

一些例子，即：

山西中阳：夜蝙蝠 $ia^{53} p^{hi}\theta^? xu^{53}$ 蝙蝠

马白虎 $mia^{24} p^{hi}\theta^{?12} xu^{24}$ 蚂蚁

山西河津：夜撒蝠 $ia^{33} p^{hi}\theta^{31} fu^0$ 蝙蝠

妈妈撒蝠 $ma^{53} ma^0 p^{hi}\theta^{31} fu^0$ 蚂蚁

山西定襄：夜蝙蝠 $ie^{53} p^{hi}\theta^? fu^{31}$ 蝙蝠

蚂匹蝠 $ma^{214} p^{hi}\theta^? fu^{31}$ 蚂蚁

山西文水：夜麦虎 $i^{35} mia^? xu^{423-21}$ 蝙蝠

麦麦虎儿 $mia^? mia^?^{2-35} xu^{423-21} e^{22}$ 蚂蚁

山西介休：夜蜜蝠儿 $i\theta^{45} mi\Delta^? xur^{13}$ 蝙蝠

蜜蝠儿 $mi\Delta^?^{423-53} xur^{13}$ 蚂蚁

山西芮城：夜 (ia^{44}) 蝙 ($p^{hi}\theta$) 蝠 ($pf^h\theta\eta$) 蝙蝠

妈妈蚩 ($p^{hi}\theta$) 蝠 ($pf^h\theta\eta$) 蚂蚁

可能‘蝙蝠’先有如下变化，即：

$pian fu \rightarrow p^{hi}an fu \rightarrow p^{hi}\theta fu \rightarrow p^{hi}\theta xu \rightarrow p^{hi}\theta^? xu$

或许 $f \rightarrow x$ 的变化比 $p \rightarrow p^h$ 早。山西方言‘蚂蚁’相应词原来是‘蚩蝠’。

‘蝙蝠’的发音靠拢‘蚂蚁’，后来为了区别两者，‘蝙蝠’加‘夜’字，‘蚩蝠’加同义词‘蚂蚁’的‘蚂’字了。上面文水、介休的‘蝙蝠’相应方言形式为何第二音节声母变成 $m-$ ，笔者还没有可靠的解释。现暂提出两种可能性：第一种是由于‘俗词源学’变来的，就是说‘夜蝙蝠’，从其‘夜’字人们都很容易联想到‘睡觉’，‘蝙’、‘眠’音近，因此变为‘夜眠蝠’（如河北赵县：夜眠虎 蝙蝠），后来发生舒声促化，终于变为如上形式了；第二是由于‘类音牵引’变来的，即‘蚂蚁’相应词带‘蚂’后，‘蚩’被同化变为 $m-$ 。后来‘蝙蝠’与此发生‘类音牵引’，其‘蝙’字声母也变为 $m-$ 了。‘蚂蚁’的音变过程概略如下：

$ma p^{hi}/pi fu \rightarrow ma p^{hi}\theta^?/pi\theta^? xu \rightarrow ma mi\theta^? xu \rightarrow mia mi\theta^? xu$

$\rightarrow mia^? mia^? xu \rightarrow mi\theta^? mi\theta^? xu$

依据这个说法，还不到完全同音的阶段，附加说明成分，后来两者词干部分（即第二，三个音节）发音进一步靠拢，终于完全一致了。与此发生“类音牵引”的‘蝙蝠’大概如下演变：

$i\text{ə pian fu} \rightarrow i\text{ə pian}/p^h\text{ian fu}/x\text{u} \rightarrow i\text{ə pi}\text{ə}^?/p^h\text{ie}^? x\text{u} \rightarrow i\text{ə mi}\text{ə}^?$
 $x\text{u} \rightarrow i\text{ə mi}\text{ə}^? x\text{u}$

介休‘蚂蚁’先有过（“蚂蚁蛉”→）“蜜蜜蛉”的阶段，可能后来发生“叠音脱落”（haplology），成为“蜜蛉”了。即使演变过程还待详细讨论，不过把上面例子看做为了回避“同音词冲突”加上说明成分而成立的例子，是毫无问题的。

岩田礼先生曾指出山东方言中‘蝙蝠’与‘壁虎’发生同音冲突。⁽²⁾这种情况不只在山东出现，云南方言中也有如下例子：

‘蝙蝠’—‘壁虎’

云南昆明：夜壁蝠	$i\text{æ}^{212} pi^{31} fu^{31}$	蝙蝠
山壁虎	$\text{ʂ}\bar{\text{A}}^{44} pi^{31} xu^{53}$	壁虎
云南玉溪：夜壁虎	$ji\text{e}^{213} pi^{31} xu^{42}$	蝙蝠 ⁽³⁾
山壁横儿	$\int\bar{\text{A}}\text{n}^{44} pi^{31} hu\text{ə}^{31}$	壁虎 ⁽³⁾
云南昭通：夜壁虎	$i\text{e}^{31} pi^{31} xu^{53}$	蝙蝠
爬墙虎	$p^h\text{A}^{31} t\text{e}^h i\bar{\text{A}}\eta^{31} xu^{31}$	壁虎
云南文山：夜壁虎	$i\text{e}^{211} pi^{42} xu^{44}$	蝙蝠
壁虎	$pi^{42} xu^{44}$	壁虎
云南蒙自：夜壁蝠	$i^{211} pi^{42} fu^{55}$	蝙蝠
壁猴	$pi^{42} x\text{əu}^{42}$	壁虎
云南思茅：夜壁虎	$i\text{e}^{213} pi^{31} fu^{53}$	蝙蝠
壁猴	$pi^{31} x\text{əu}^{31}$	壁虎

可能如上云南方言‘蝙蝠’词先有过和山西方言大同小异的变化，其发音靠拢该方言‘壁虎’相应词，结果与此之间发生“同音冲突”了。后来为了区别两者，‘蝙蝠’前面加“夜”字，‘壁虎’前面加和“壁”同义“山墙”的“山”

(4) 如此形成“山壁虎”，后来因“壁虎”会爬山，此“山”引起让人联想到“爬山”，经过“爬山壁虎”进一步变成“爬山虎”（河北博野方言）。丢掉了“壁”字，在古清入归阴平的方言中有由于回避说与忌讳词同音的词的可能。在其他方言中大概是追求省劲的结果，因为作为常用词，四字组太长。“爬墙虎”许是从“爬山虎”造出来的。一种藤本植物又叫做“爬山虎”，又叫做“爬墙虎”，据此可推知“爬山虎”和“爬墙虎”容易混同。“壁虎”义的“爬山虎”也会同样变成“爬墙虎”。

可是如此解释尚有问题。虽然有“爬墙虎”、“爬山虎”、“爬壁虎”（云南永善方言），但未找出“爬墙壁虎”、“爬山壁虎”以及“墙壁虎”等实例。或许作为常用词极不稳定，虽曾存在过，但早已消失了。

“壁猴”的改法不是“附加说明成分”，而是“改词”。或许是由于“俗语源学”从“壁虎”变来的。这也大概同样是由于从其爬墙动作联想到爬树猴子的缘故。

安徽方言当中也曾经有过同样冲突，其解决方法是“改词”：

‘蝙蝠’—‘壁虎’

安徽含山：壁虎子	pie ⁷ xu ²¹³⁻²¹ tsɿ ⁰	蝙蝠	
	四脚蛇	sɿ ⁵⁴ tɕyɿ ⁷ sɿ ⁴⁵	壁虎
安徽来安：鳖蝠	piə ⁷ fu ⁰	蝙蝠	
	四脚蛇	sɿ ⁵³ tɕiə ⁷ sɿ ³⁵	壁虎
安徽固镇：鳖虎	pie ²¹²⁻²¹ xu ⁰	蝙蝠	
	蝎虎子	ɕie ²¹²⁻²¹ xu ²⁴ tsɿ ⁰	壁虎
安徽阜阳：鳖（pie ²¹³ （阳平））虎子		蝙蝠	
	蝎（ɕie ²¹³ （阴平））虎子	壁虎	
安徽太和：夜鳖虎子（缺音标）		蝙蝠	
	蝎虎子（缺音标）	壁虎（谓其吃蝎子）	

‘蝙蝠’先发生特殊音变后，由于“类音牵引”其读音靠拢‘壁虎’，引起同音词冲突。为了避免歧义，‘壁虎’改其词形，变成“四脚蛇”⁽⁵⁾、“蝎虎子”。

了。后者的“蝎”是否本字，如何形成，均未十分清楚。山东方言有“蝎壁虎”，虽然周围方言中还没发现如此形式，阜阳、太和的“蝎虎子”有经过“蝎壁虎子”变来的可能。

2. “货”（—“祸”）

2.1. “货郎”

常用词因常用之故，常常发生特殊音变。下面山西方言例子里的“货”都是原来去声由于舒声促化变成入声的：

A. 山西文水：货郎子 $xuəʔ^{312} lu^{22-11} tsəʔ^{2-35}$ 卖布匹的货郎
(=山西大同、定襄、孟县、临县)

山西长治：忽乱子 $xuəʔ^4 luəŋ^{44} təʔ^{535}$ 货郎。“忽乱”，货郎摇的小鼓儿（小锣）发出的声音。

山西清徐：货郎儿 $xuəʔ^2 lb^{11-35} ai^{11-43}$

山西左权：小货郎 $ɕio^{53} xuəʔ^{44} lo^{53}$

山西忻州：摇货郎子的 $io^{31-42} xuəʔ^2 le^{313} tə^0 tie^0$ 货郎

山西中阳：摇货郎的 $iao^{44} xuəʔ^2 lo^{44} te^0$ 货郎儿（=山西临县）

山西和顺：货郎担 $xuəʔ^{21} lb^{22} tæ^{44}$ 货郎儿

山西山阴：货郎担儿 $xuəʔ^4 lb^{313-31} tʌr^{335}$ 货郎儿

山西长子：货郎担子 $xuəʔ^{212} laŋ^{24-212} tæ^{45} təʔ^4$

这种舒声促化一般在轻读音节出现，属于一种语流音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词组在没有舒声促化的方言里也往往发生特殊音变。下面例子大都脱落介音，并改调为阴平，呈现与A类不同另一种类型：

B. 山东平邑：货郎 $xə^{213-21} laŋ^0$ ；阴平调值：213

“货” $xuə^{312}$ （去）=“祸”；“喝貉褐鹤豁涸” $xə^{213}$ （阴平）；

“拨” $pə^{213}$ （阴平）

山东济南：货郎 $xə^{213-21} laŋ^0$ ；“拨” $pə^{213}$ （阴平）

喝楞鼓 $xə^{213-21} ləŋ^0 ku^{55}$ 拨浪鼓，一种儿童玩具

“货” xuə³¹ (去) = “祸”; “喝鹤豁吓” xə²¹³ (阴平)

山东曲阜: 货郎鼓 xə³¹²⁻³¹/xy²¹³⁻¹³ laŋ⁴²⁻⁵⁵ ku⁵⁵ 货郎

“货” xuə³¹² (去) = “祸”; “喝” xy²¹³ (阴平); “拨” pə²¹³
(阴平)

山东济宁: 呵郎鼓儿 xy²¹³⁻²¹ laŋ⁰ kur⁵⁵ 货郎 (=曲阜)

江苏徐州: 喝郎鼓子 xə²¹³ laŋ⁰ ku³⁵ tsŋ⁰ 货郎鼓或小孩玩的拨浪鼓

货郎鼓子 xə²¹³⁻²¹ laŋ⁰ (或 ləŋ⁰) ku³⁵ tsŋ⁰

“货” xuə⁴² (去) = “祸”; “拨” puə²¹³ (阴平)

货郎 xuə⁴² laŋ⁵⁵ (或 laŋ⁰)⁽⁸⁾

B'. 山东博山: 货郎 xuə³¹⁻²² laŋ⁵⁵⁻³³⁽⁹⁾; “拨” pə²¹⁴ (阴入)

“货” xuə³¹ (去) = “祸”; “豁霍擻剿郝鹤” xuə²¹⁴ (阴入)

货郎鼓 xuə³¹⁻²¹ laŋ⁵⁵⁻²² ku⁵⁵

cf. 山东淄川: 拨浪鼓 pə²¹⁴⁻²¹ laŋ⁵⁵⁻²² ku⁵⁵

cf. 河北大厂: 拨浪鼓儿 货郎鼓儿 (=河北乐亭、丰润、玉田、枣强等)

cf. 河北安次: 拨浪鼓子 货郎鼓儿

cf. 河北遵化: 拨棱鼓 货郎鼓儿 (=河北昌黎、滦县)

cf. 河北阳原: 八郎鼓 货郎鼓儿 (=河北龙关、永年、元氏)

cf. 河北赤城: 梆郎鼓 货郎鼓儿 (=河北龙关)

宁夏中卫: 货郎担子 xuə⁴⁴ laŋ⁰ tāi¹³ tsŋ⁰ 手摇卜郎鼓, 沿街叫卖的
小商贩 “货” xuə¹³ (去) = “祸”; “豁” xuə⁴⁴ (阴平); “拨”
pə¹³ (去)

cf. 甘肃敦煌: 巴郎子 pa²¹ lɔ²⁴ tsŋ² 摇手鼓的货郎担

cf. 新疆乌鲁木齐: 巴郎鼓 pa²¹ lɔ²⁴ ku⁵²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

为何改为阴平, 原因大概在与同义词“拨郎(鼓)”的混同。现暂把“拨郎
(鼓)”看作本文所举一系列同源词最原先的形式, 其本字问题未十分清楚。下

文有所讨论。上面方言中古清入声字大都现归为阴平，“拨”字也是古清入，应该念为阴平。所据文献均只举“货郎（鼓）”，没提“拨郎（鼓）”，但看来这两个词在同一地区混杂存在，譬如河北昌黎方言中两者并存。混同会很容易发生。这种混同所引起的音变严密来说，该叫做“交感”，现把它视为同义词之间的“类音牵引”。根据如此解释，唇音声母不分开合，山东博山的例子保留介音有充分理由，可以把它同样看待。该方言的“货郎”应该采取【去声+轻：31-55+31】的变调调值，但实际音值却与【阴入+轻：214-22+33】同。“货郎鼓”的“货”也同样采取阴入调值。参看淄川的“拨郎鼓”。此例承蒙《淄川方言志》作者孟庆泰先生指教。孟先生所用淄川口头乡话与博山方言大同小异，也可以看做博山方言的一种。

徐州方言“货郎”与“货郎鼓”之间呈现分歧现象。如此分歧许是由于材料来源不同，反映所属方言层次上的差别。该方言“货郎鼓子”的“货”（亦写做“喝”）念阴平，“货郎”的“货”却念去声，而且未失去介音，与其单字音一致。如果徐州“货郎”属于新派读音，现有如下可能：一般来说，“货郎”是过去的一种行业，现已很少见。所以，日常生活中极少用到，新派读音很可能按其单字音读。另外的一种解释，即如果先在“货郎鼓”和“拨郎鼓”之间发生“类音牵引”，徐州方言或许代表“货郎”未发生类化为“喝郎”或“贺郎”的阶段。

宁夏中卫方言“货”同样单字音为去声，“货郎”里的“货”却为阴平。但与上面类例不同，“拨”字是去声。大概先有“俗词源学”所引起“拨郎鼓”改为“波浪鼓”的变化，上面敦煌，乌鲁木齐的例子也可能有过同样变化，经过如下音变过程：

po? laŋ ku → po laŋ ku → pa laŋ ku; 或

po? laŋ tsŋ → po laŋ tsŋ → pa laŋ tsŋ^{aa}

下面是把“货郎”（=“祸郎”）改为“贺郎”，似乎发生进一步变化的例子：

C. 山东新泰：货郎 xə⁴¹（去）lā³（轻）“货”xuə⁴¹（去）=“祸”；“贺”

xə⁴¹（去）（=山东郯城、莒南）

山东掖县：货郎 $xə^{42} laŋ^0$ ；

“货” $xuə^{213}$ (阴平) = “祸”，又 $xuə^{42}$ (阳平)；“贺” $xə^{213}$ (去)

山东临清：货郎鼓儿 $xə^{31} la^{53-0} kur^{55}$ ；“货” $xuə^{31}$ (去) = “祸”；“贺”

$xə^{31}$ (去)

山东济南：货郎鼓 $xə^{31} laŋ^0 ku^{55}$ (又)；“贺” $xə^{31}$ (去)

上面例子仍然用“货”字，但与“贺”字同音。这不是偶然的事情。我们应该注意B、C之间的先后关系。上面已经谈到，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。另有双方互相无关，独立变来的可能。因为一部分中古果摄牙喉音声母合口字现在不少方言中变为开口，“货”字很有可能经过如此历史音变失去合口介音。C类如不经过B的阶段的话，那么上面例子还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，偶然与“贺”字同音；二是由于回避与“祸”字同音，改音成立。避讳改音决不是乱改，其改法有一定的规律，即改声韵调之一部分，仍保持与原来字音之间的类音关系。不然，随便破坏音义之间的对应关联，一听新字音很难理解其原义了。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，其改法基本与语流音变一致。“货”字去掉u介音回避与“祸”字同音，也有十分可能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也可以认为先有C类，B类是后来C类与“拔郎鼓”之间发生“交感”而成立的。现还不能排除如此异论，但与“拔郎鼓”之间的“交感”不必等待变成C的阶段。B类实例比C类更广泛存在，在“货”字带u介音而声调为去声的形式（即 $xuə$ (去)）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一点像是证明先有B。下面D类“货”字特殊读音不和“贺”一致。从此看来，即使忌讳词引起发生特殊音变，并不是非得改为与反义词“贺”同音。因此暂看做C类是经过B类的阶段成立的。换言之，C类是由于B类和“货郎（鼓）”（“货”字带u介音，调为去声）之间发生“交感”的结果。

下面实线以上的例子也是和B类同样与“拔郎鼓”混同而成立的。可是“拔郎鼓”的语音形式不同，因此音变结果也不同了：

D. 宁夏中宁：货郎子 $xu^{44} laŋ^0 tsŋ^0$ 旧时指挑担叫卖的小贩

“货” xuy^{13} (去) = “祸”；“乎呼孤” xu^{44} (阴平)

宁夏银川：呼郎子 $xu^{44} laŋ^0 tsɿ^0$ 货郎

陕西临潼：呼（货字转音）郎 货郎；阴平单字调值：31

青海西宁：货郎子 $xv^{44} lɿ^{24} tsɿ^0$ 货郎；阴平单字调值：44

“货” xu^{213} （去）=“祸”；“呼忽” xv^{44} （阴平）

宁夏固原：呼郎子 $xu^{24} laŋ^{24} tsɿ^0$ 货郎；阳平单字调值：24

“货” xux^{213} （去）=“祸”；“核果～胡瓢～芦乎壶狐湖” xu^{24}

（阳平）

陕西铜川：货（货音讹为 hu 上声，xǔ）郎 挑担卖京货者⁰⁰

山东菏泽：拨楞鼓子 $pu^{13-21} ləŋ^0 ku^{55} tsɿ^0$ 货郎鼓；阴平单字调值：13

河南邓州：不郎鼓儿 $pu^{44} laŋ^0 kur^{54}$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

“不” pu^{44} （阴平）（=陕西西安）

河北滦县：不郎鼓儿 货郎鼓 ← “拨郎鼓儿”（=河北迁西、南宫等）

南宫：“不” pu^{21} （去）

山东桓台：卜楞鼓子 $pu^{33} ləŋ^0 ku^{55-213} tsɿ^0$ 货郎鼓；入声单字调值：33

河北围场：不楞鼓子 货郎鼓 ← “拨郎鼓儿”（=河北滦县、元氏等）

河北乐亭：摇不楞鼓的 货郎 ← “摇拨郎鼓的”

河北晋县：摇不楞等的 货郎 ← “摇拨郎担的”

山西永济：摇布郎鼓儿的 $iau^{24} pu^{33} laŋ^0 kur^{42} ti^0$ 游商

担货郎担子的 $tæ^{21} xuo^{33} laŋ^0 tai^{33} tsɿ^0 ti^0$ （又）

山西吉县：拨郎担 $pə^{423-42} ləŋ^{13} tæ^{33}$ 摇货拨郎鼓叫卖的流动小商贩

“拨” $pə^{423}$ （阴平）

河北昌黎：拨郎鼓儿 $puo^{32} laŋ^0 (ləŋ^0) kur^{213}$ 货郎鼓儿（又）

“拨” puo^{32} （阴平）；

“不” pu^{32} （阴平）；“不～是” pu^{24} （阴去）

上面D类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，其特征是“货郎（子）”的“货”变成xu，并且其调变为阴平的占多数。如此形式也可以认为与“拨郎鼓”之间发生“类音

牵引”（严密来说是“交感”演变来的）。注意，这里的“拨郎鼓”语音形式与上面不同，是另一种类型。或许先有避讳改音，“货”（一“祸”）变成 xu（去声），此后与“拨郎鼓”发生“类音牵引”。可是未找出“货郎”的“货”念为 xu（去声）的例子。据目前材料来说，不像是经过避讳改音变来的。大概曾经有过如下变化：

puə? laŋ ku → puə laŋ ku → pu laŋ ku
（“拨郎鼓” “波浪鼓” “卜郎鼓”）

因为音近，由于“俗词源学”“拨郎”变为“波浪”，这两个音节后来一般轻读，终于 puə 变为 pu 了。第二阶段不一定需要。或许从第一阶段一下子飞跃变为第三个阶段。如果“卜郎”作为“卜者”义的词实际存在，那么后一段也算是“俗词源学”所引起的变化了。据贺巍、钱曾怡、陈淑静三位先生的论文^[10]，河北一些方言把古清入声字大都念为阴平。“不”字作为否定词极常用，容易发生特殊音变成为例外，不但其韵母不一定是 u，其调类也不一定是阴平，目前尚不能马上类推判断。可是如和其他例子一起考虑的话，其声调很可能也都是阴平。据《乐亭县志·方言志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. 9）描写，该方言“不”字除了后面带去声的时候以外都记作阴平。如果上面其他例子里见到的“不”字与“货”字同样念为去声，这也是“类音牵引”所引起的变化了。宁夏固原方言为何把“货郎子”的“货”改为阳平，尚未找出适当的理由。24（阳平）许是214（阴平）之误。

关于“拨郎鼓”的词源，日本明治大学讲师刘光赤先生指出有根据打鼓声起名的可能，即“拨郎”是拟声词。一般来说，拟声词大都由平声拼，清声母是阴平，浊声母是阳平。那么“拨郎鼓”的头一个音节，无论用如何字来写，除了有入声的方言以外都可以认为是阴平了。根据如此看法，第一个音节反正是阴平，说起来不产生任何大矛盾。B'类中卫例子更容易理解了。但博山“货郎”第一个音节变调调值为何不和【阴平+轻】，而和【阴入+轻】一致，这一点需要说明了。现在只能说，由于避免“货”一“祸”同音而改音的结果。【去+上：31+55】（不变）和【平+轻：214-31+23】变调调值有点接近，

或许为了避免字“货”一“祸”同音，“货郎”的“货”经过与“货郎鼓”的“货”同调（即阴平）进一步变，终于采取阴人变调调值了。

如此看来，山西方言‘货郎’里‘货’的特殊音变也有由于‘类音牵引’（严密来说是‘交感’）以及‘类化’发生的可能。虽然山西方言当中还没找出适当例子，可是临接地区方言有如下例子：

河南获嘉：摇拨郎鼓的 iau³¹ peʔ³ laŋ⁰ ku⁵³ li⁰

河北邯郸县：不郎鼓儿 货郎鼓←“拨郎鼓儿”（=河北赤城）

“不” /be⁵⁴ (入)⁰³

河北沽原：不楞鼓子 货郎鼓←“拨郎鼓子”；“不” /beʔ³² /⁰³

河北万全：不楞子 货郎鼓←“拨郎鼓”；“不” /beʔ²¹ 或 bueʔ²¹ /⁰³

河北阳原：大不楞 货郎←“担拨郎”；“不” /beʔ²¹ 或 bueʔ²¹ /⁰³

具体演变过程大概如下：先“货郎鼓”和“拨郎鼓”之间发生“类音牵引”，

“货”字促化，然后由于类化“货郎”读音和“货郎鼓”的“货郎”一致。

限于目前所能看到的例子，把“货郎鼓”和“拨郎鼓”用“类音牵引”来解释，比以“货”一“祸”的“同音词冲突”更有说服力。但是还有一个未能解释的问题，即是山东、河北、河南一带既有“拨郎鼓 pu laŋ ku”，为何没有“货郎（鼓） xu laŋ (ku)”？解决这个问题要待搜集更多例子做进一步的研究。

2.2. ‘瓢虫’一‘萤火虫’

有些方言把‘瓢虫’叫做“货郎（子）”，这个词组里的“货”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。先参看如下例子：

山西定襄：活口子 xuɔ² luɔ²¹⁴ tə² 瓢虫←“货郎子”

货郎子 xuɔ² luɔ²¹⁴ tə² 货郎

“货” xuɔ⁵³ (去)=“祸”

定襄方言舒声促化后，人们没意识到‘瓢虫’与‘货郎’实际上是同一个来源。拿不准本字，随便写个吉利的同音字了。下面是和定襄方言类似，此它更复杂

些的例子：

河北遵化：火梭子 $xu\gamma^{214} lə\eta^{55} tsə^0$ 瓢虫；上声调值：214=河北青龙

货郎子 $xu\gamma^{214} lə\eta^{55} tsə^0$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

河北丰润：火郎虫儿 / $hu\delta langch\acute{o}ngr/ xu\delta^{21} la\eta^{20} ts^h u\tilde{r}^{33}$ 瓢虫

又称“火郎子” 《县志》

河北秦皇岛：火龙虫 $xuo^{214} lə\eta^0 ts^h u\eta^{35}$ 瓢虫

河北乐亭：火螂 花大姐

河北完县：虎螂儿 花大姐←“火螂儿”

河北昌黎：货郎 $xuo^{213} la\eta^0$ ；上声调值：213

“货” xuo^{55} （阴去）=“祸”

cf. 火郎虫儿 $xuo^{213} la\eta^0 ts^h u\delta r^{13}$ 萤火虫←“火亮虫儿”

遵化方言的“货”，单字音没有记载。如不是例外字，应该念为 $xu\gamma^{55}$ 。有关变调调值如下，即【上声+轻：214+0】（不变）；【去声+轻：51+0】（不变）。所据文献没有说明三音节的变调情况。从此推想，“货郎子”里的“货”应该是51调，但实际调值却与【上+轻】同。昌黎方言“货郎”的“货”字也与此相同。单字调阴去，该采取【阴去+轻：55+0】（不变。少数为55-24+0）的变调调值，但实际调值却与【上+轻】同。就是说，上面河北遵化、丰润、秦皇岛、昌黎、乐亭以及完县的‘瓢虫’、‘货郎’相应词头一个音节都读为上声。其理由该归于‘瓢虫’和‘萤火虫’两个词之间发生的“类音牵引”。先参看下面例子：

‘瓢虫’

山东青岛：货郎鼓儿 $xu\delta^{42-55} la\eta^0 kur^{55}$ 七星瓢虫，主要捕食蚜虫

小货郎儿（又）

山东平度：货郎鼓儿 $xu\delta^{53} la\eta^0 kur^{55}$ 瓢虫的统称（=掖县）

河北丰润：货郎虫 花大姐

货郎子 花大姐

山东胶州：货郎 /huòláng/ xuə⁵³ laŋ⁰ 花大姐
 山东即墨：货郎 xuə⁴² laŋ⁰ 花大姐（七星瓢虫）

‘货郎’

河北吴桥：货楞 货郎（=河北三河）
 河北迁西：货楞子 货郎（=河北遵化、蓟县、宝坻、玉田、青龙）
 山东即墨：货冷 货郎，农村行商者亦专指卖布绒线者而言

‘货郎鼓’

河北黄骅：货冷鼓 货郎鼓
 货楞鼓儿 货郎鼓（=河北吴桥）

‘萤火虫’

河北昌黎：火郎虫儿 xuə²¹³ laŋ⁰ ts^huor¹³ 萤火虫
 河北抚宁：火/lēng/虫儿 萤火虫
 山东平邑：火连虫 xuə³⁴ lian⁵³ p^həŋ⁵³ 萤火虫
 云南维西：火亮虫 xo⁵³ liǎŋ²¹³ ts^hoŋ³¹ 萤火虫
 安徽霍山：火亮虫子 xo²⁴ lian⁵³ ts^həuŋ²¹⁴ tsŋ⁰ 萤火虫
 安徽安庆：火亮虫儿 xo（上） lian（去） ts^hoŋ（阳平） or（轻） 萤火虫
 可能‘萤火虫’先有过如下音变：

“火亮虫” xuə lian ts^huŋ → xuə laŋ ts^huŋ → xuə ləŋ ts^huŋ

其语音形式靠拢‘瓢虫’该方言相应词“货郎虫”，与此容易混同了。如果“货郎虫”第二个音节的主要元音弱化发生 xuə laŋ ts^huŋ → xuə ləŋ ts^huŋ 的变化，那么除了声调以外没有任何区别，尤其容易混同。说起“货郎虫”，很容易联想到“火亮虫”。“货”字改为“火”字是并不难理解的。如此音变或许背后有避讳改音的意图，但不必提到它。可以认为是完全由于“类音牵引”把“货郎虫”的“货”解为“火”的结果。参考文献所举遵化“萤火虫”相应词为“棉花虫 mien²² xuə⁰ ts^huŋ⁰”。看来没有呈现与‘瓢虫’之间类音关系，按

山东淄博：活路 xuə⁵⁵⁻²⁴ lu⁰ 棺材=山东邹平
山东日照：生活 səŋ²¹³ xuə⁰ 棺材

河北赤城：卖生活的 货郎←“卖活的”←“卖货的”
河北龙关：卖货的 货郎

山东平邑：牀 xə⁵³ 棺材；≠“货” xuə³¹²（去）=“祸”；
≠“活” xuə⁵³（阳平）

河南郑州：牀 xuə³¹² 棺材；=“货” xuə³¹²（去）=“祸”；
≠“活” xuə⁴²（阳平）
（=河南获嘉，开封³⁰，濮阳，沁阳，林县）

河南卫辉：喜牀 寿木，寿材

河南商水：喜货/xi⁵⁵ huə³¹/ 为活着的老人准备的棺材

河南太康：喜活/xi⁵⁵ huə⁵³/ 给老人生前预制的棺材

河北巨鹿：土货 t^hu⁵⁵ xuə¹¹ 棺材的婉辞

河南上蔡：土活/tu⁵⁵ huə⁵³/ 棺材

和本文上面提出其他例子一起考虑，也有本字为“货”的余地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些例子都把“祸”改为“活”，意指‘死’转为‘活’。譬如山东博山例子把“寿货”改为“寿活”，再加上“路”字来找出活路，较为明显看出此意图。山东淄博、日照、河南太康、上蔡的形式中也可看出同样意图。那么，“牀”许是“货”字产生了“棺材”义以后，为了区别于普通词义的“货”，破读为阳平，随之打上的白字了。但我们应该注意，中古以前“货”、“活”两字区别不只在声调，声母、韵母都不同，不能说有类音关系。如果早期发生如此避讳改音，很难设想改为与“活”同音。

“牀”字早已在《广韵》，《集韵》中都有记载，如：

《广韵》：户戈切（果合一平戈匣）“棺头”

《集韵》：胡戈切（果合一平戈匣）“𦵏，博雅，棺当谓之𦵏，或从木，通作和”

cf. “货” 《广韵》：呼卧切（果合一去过晓）

cf. “活” 《广韵》：户括切（山合一入末匣）

“𦵏”字很可能从古老时代起一贯存在。虽然上面例子含有还要进一步检讨本字的，现认为“棺材”义词的“𦵏，口”（阳平）和“货”（去声），来源不同。河南郑州等方言中把“𦵏”读为去声，可能是“交感”的结果。就是说，如上“棺材”义词里看到的“货”字音的分歧果然与3章里介绍的特殊音变似是而非的现象。⁹⁹

在讨论会报告之后，承蒙岩田礼先生指教。另外有机会在汉语史研究会（于日本青山学院大学 1997. 11. 2）介绍本文内容。此时刘光赤女士以外，钱曾怡、平山久雄、远藤光晓等先生以及其他参会的人也给我提供宝贵意见，谨此鸣谢。

注：

- (1) 贺登崧 (W. A. Grootaers) *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*, *Monumenta Serica* X, pp. 389-426 1945; 现用日译本：岩田礼·桥爪正子《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》(好文出版 1994. 9)。岩田先生曾在《汉语方言史の不連続性—中国语言地理学序说—》(静岡大学人文学部人文论集 45-2 1995. 1 第43-77页)举河北、山西方言的例子讨论过这个问题。
- (2) 参看，岩田礼《读〈山东方言志丛书〉六种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96年第3期 第236-240页。该文举了一些山东方言的例子介绍“同音牵引”（即“类音牵引”）和“同音冲突”。
- (3) 两项词例出处不同，记音法不一致。
- (4) “山”有“山墙”的意思，这一点承蒙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研究生张世方指教。
- (5) 不少方言里“壁虎”和“蜥蜴”区别并不明确。看方言，同一词形又指“壁虎”，又指“蜥蜴”，如：“四脚蛇”：云南永善方言指“蜥蜴”。
- (6) 【阴平+轻声】变为213-21+0；【去声+轻声】变为312-32+0。（第15页）
- (7) 据同一文献，变调调值如下：【阴平+轻声】变为213-21+0或213-22+0。后者阴平多为中古清入声字；【去声+轻声】变为31-42+0。（第11页）
- (8) “货郎”读音承蒙徐州师范大学吴继光先生指教。
- (9) 博山方言阴入单字调与阴平同，因此所据文献不分两者，把它归于一个平声。可是变调调值不尽相同。如：【阴平+轻】213-31+23；【阴入+轻】213-22+33。同样，阳平（古浊平）和上声（古清上与次浊上）也在单字音系中合并。在一些条件下变调调值不同。参看钱曾怡《博山方言研究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. 6 第25-31页。
- (10) 乌鲁木齐方言的例子出自刘俐李《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》(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9. 8 第109页)。周磊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》(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. 12)有：

巴郎鼓 pa⁴⁴ laŋ⁴⁴ ku⁵¹ 玩具，带把儿的小鼓，来回转动时，两旁系在短绳上的鼓槌击鼓作声

巴郎子 pa⁴⁴ laŋ⁵⁵⁻⁴⁴ tsɿ⁰ 孩子，儿童 || 借自维吾尔语 [bala ŋiz] (孩子+第二人称) (第72页) 不知西北地区维吾尔语对汉语方言有多大影响。如果先有这个“巴郎子”，且该词作为常用词相当普遍存在，那么“拨郎鼓”头一个音节变为 pa 或许也是联想到类音词“巴郎子”的结果，这就是“俗词源学”所引起的变化了。

- (1) 原文 hu 用注音字母拼写，现改为汉语拼音。xǔ 如原文，是拉丁字母。此项所上说上声到底是当地上声，还是普通话上声，含意未详。
- (2) 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(稿)》，《方言》1986-4 第241-252页
- (3) “不”字音现据《河北方言概况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1. 10) 推测。
- (4) 上面开封方言的例子据《开封县志》(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. 7 第529-552页)。这里的例子据《河南省志·方言志》(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. 11)。
- (5) 笔者在前文《北方方言怪音例集(2)》(《神户外大论丛》46-2 1995. 2) 里把与3的例子同样看做避讳改音，改词。此处为修改后的意见。

※本文原题为《“同音词冲突”和“类音牵引”》，在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(1997. 7. 22-24 青岛)上宣读，拟载于《首届官话方言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但远超过篇幅限制，《文集》只收了第一章。编辑部允许全文另外发表。这次发表，如上改题，增加了若干例子，修改了一些文句。